



JLWE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JLWE, Vol. 1, No. 2, 2025, pp.185-191.

Print ISSN: 3078-8129; Online ISSN: 3104-507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w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5.2.01>



悬法：《铁器时代》中的赤裸生命

罗文杰 (Luo Wenjie), 史菊鸿 (Shi Juhong)

摘要：对于库切小说《铁器时代》中的民众悲惨命运，学术界多将其归因于种族隔离制度本身，却忽略了制度背后更深层次的政治生命机制。本研究结合阿甘本和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揭示了小说中苦难的生成机制，分析了种族隔离如何通过“悬法”将个体降格为赤裸生命。进一步地，本文从个体、家庭和社会三个维度探讨了生命所遭受的生存困境，并分析了隐藏在压迫下的抵抗策略，展现个体在极权政治中的生存与抗争可能。

关键词：《铁器时代》；赤裸生命；悬法

作者简介：罗文杰，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文学，电邮：1032955648@qq.com。史菊鸿（通讯作者），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语小说研究，电邮：shijuhong@lzu.edu.cn。

Title: Suspension of Law: Bare Life in *Age of Iron*

Abstract: In *Age of Iron* by J.M. Coetzee, the characters' misery is often ascribed to the apartheid system, yet the deeper political-biological mechanisms sustaining that system remain underexplored. This study, drawing on Agamben's and Foucault's theories of biopolitics, investigates the mechanisms of suffering in the novel, showing how apartheid, through the "suspension of law," reduces individuals to bare life. It further examines the existential struggles of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society, and uncovers the subtle forms of resistance embedded within oppression, thereby highlight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survival and defiance under authoritarian rule.

Keywords: *Age of Iron*; Bare life; Suspension of Law

Received: 10 Sep 2025 / Revised: 06 Nov 2025 / Accepted: 27 Nov 2025 / Published online: 30 Nov 2025 / Print published: 30 Dec 2025.

Author Biography: Luo Wenjie, Master's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Lanzhou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1032955648@qq.com. Shi Juhong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Lanzhou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English fiction. E-mail: shijuhong@lzu.edu.cn.

一、引言

南非作家库切 (J. M. Coetzee) 出版于 1990 年的小说《铁器时代》(*Age of Iron*) 聚焦于南非社会的种族歧视与制度性暴力, 同时揭示了种族隔离背后主权力对生命的深度介入与操控。学界对此著作的研究基本集中于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视角。例如, 赖特 (Laura Wright) (2008, pp. 11-32) 指出库切通过白人女性叙事主体, 揭示了南非女性——无论白人还是黑人——在政治与历史结构中被持续边缘化的处境。萨利赫和贾努里 (Salih & Janoory) (2020, pp. 267-276) 则分析了小说中的黑人女性角色, 探讨她们在种族隔离语境下所承受的性别与种族双重压迫。李琛 (2010, pp. 410-418) 关注文化混杂对黑人、混血人群及白人造成的身心创伤, 以及他们对苦难与动荡的多样化回应。邵凌 (2010, pp. 78-84, 159) 则从殖民话语批判的角度指出, 《铁器时代》揭示了权力更迭过程中对个体尊严的持续摧毁。这些研究大多将民众的苦难归因于性别与殖民种族结构, 且往往局限于特定群体的困境分析, 倾向于将悲剧的根源直接归结于种族隔离制度本身, 而较少深入探讨该制度背后更深层次的政治—生命机制。事实上, 小说中种族隔离只是主权力运作的工具之一。在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日常法律被悬置的社会情境下, 个体生命——无论种族与性别——均沦为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 意义上的“赤裸生命” (bare life), 成为权力可任意支配的对象。

由此可见, 《铁器时代》所呈现的核心问题并不仅仅是种族隔离下的族群冲突, 而是主权力在非常状态中对生命的全面控制与摧残。库切在小说中展现出鲜明的政治与伦理关怀, 不仅深切同情苦难中的生命, 也反思其历史根源, 并在叙事中蕴含着对救赎可能性的探寻。因此, 从生命政治的视角切入, 对《铁器时代》进行分析, 不仅有助于揭示不同种族、不同性别群体在主权力操控下的共同生存危机, 也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小说的政治伦理内涵。本文将“赤裸生命”为切入点, 结合阿甘本的政治哲学理论, 并辅以福柯 (Michel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思想, 剖析小说中苦难的运行机制, 探讨生命所遭受的生存困境, 并分析其中隐含的抵抗策略。

二、赤裸生命的生成机制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在借鉴古希腊生命观的基础上, 提出了极具影响力的“赤裸生命”概念。他延续了古希腊对生命的二分理解, 将生命区分为两种形态: 一是纯粹的生物性存在 (zoé), 指一切生物所共有的自然生命; 二是政治性生命 (bios), 即被纳入城邦共同体、能够参与公共事务的生命。(Agamben, 1998, p. 1) 在此框架下, 赤裸生命指的是被剥夺政治身份、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却又被纳入政治秩序运作之中的生命状态。这类生命既不能完全归入自然状态的自由形态, 也无法获得完整的公民权与政治资格, 而是处于一种“可以被杀死却不能被祭祀” (Agamben, 1998, p. 110) 的境地。在阿甘本看来, 赤裸生命并非古代或极权历史的遗产, 而是现代政治秩序中始终潜伏的一种可能状态。换言之, 在当代社会中, 任何个体都有可能特定条件下沦为赤裸生命, 而这种转化的关键机制, 正是主权通过制造“例外状态”来悬置法律, 从而直接干预和支配生命。

“例外状态”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 (Carl Schmitt) 在其《政治神学》 (*Political Theology*) 中提出。施密特指出, 例外状态并非日常法律秩序的一部分, 而是与之相对的法律秩序自身的暂时中止。他在著作中指出: “主权者是能够决定例外状态者。” (Schmitt, 2005, p. 6) 阿甘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 例外状态并不意味着特别法的生效, 更重要的是法律本身的悬置——主权者拥有合法中止法律体系基础结构的权力, 使其能够不受法律限制地直接对生命实施控制。(Agamben, 2000, p. 2) 在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后期, 1985年至1990年间多次实施的全国紧急

状态，就是主权通过悬法机制将公民生命政治化的典型案例。1985 年首次实施紧急状态的直接背景，是自 1984 年起黑人聚居区爆发的大规模骚乱，这些骚乱反映了民众对种族隔离制度的高度不满。紧急状态使政府得以绕过常规法律程序，掌握包括无限期拘押、宵禁、新闻审查、组织解散等在内的非常规权力。1986 年 6 月，紧急状态范围扩展至全国，镇压升级为高强度状态，警方权力显著扩大，法院的监督功能被严重削弱，整个法治体系几近停摆。在这种制度性悬法的环境中，南非公民被系统性地剥夺法律保护，沦为阿甘本意义上的赤裸生命。

在《铁器时代》中，库切通过细腻的叙事展现了主权在例外状态中对个体生命的多重规训。这种规训首先体现在对社会空间的重构上。福柯（1986, pp. 22-27）指出，空间并非权力运作的被动容器，而是权力组织与再生产的重要媒介，空间本身参与权力的分配、流动与再生产。在小说中，黑人聚居的古古莱图被设定为一种“例外地带”，常规法律在此失效，国家机器可以随意逮捕、枪击居民——“在古古来图随时都有麻烦，警察会闯进屋里开枪的。”（库切，2024, p. 22）在这样的空间结构中，黑人被剥夺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身份，生命被降格为可牺牲的存在。对白人而言，表面上虽享有特权，但这种自由同样受到空间隔离和安全检查的严格限制。例如，卡伦太太多次遭遇路障，被警察阻拦进入隔离区——“您不该待在这儿。我们会通知警察，他们能护送您出去。”（库切，2024, p. 46）这表明，白人的行动自由是有条件的，一旦越界，便可能像黑人一样被限制甚至驱逐。医院的空间转化更具象征意义。原本作为中立的人道主义场所，医院在例外状态中沦为主权过滤生命的工具——区分“可治之人”与“可弃之人”。黑人伤员常被转移、隐匿、拒收，甚至在医院中遭遇追捕。例如，黑人男孩约翰在遭遇警察袭击后，被反复隐匿与拒绝治疗。弗洛伦斯愤怒地控诉：“他那不是待在医院，那是待在一个葬礼等候室。”（库切，2024, p. 32）在此情境下，白人虽可获得相对完善的治疗，但这种优待建立在他们顺从权力逻辑的前提下。可见，空间在例外状态中被重新编码为权力运作的关键场域，为赤裸生命的生成提供了地理基础。

其次，主权利力通过对身体的全方位规训进一步塑造赤裸生命。这种规训既依赖直接的暴力介入，也依托制度化的监控体系维系。警察作为国家暴力的直接执行者，对黑人群体实施着无处不在的控制。小说中，“三辆卡其色的运兵车几乎和林子融合在一起，但在天光映照下，头盔的轮廓分明，”（库切，2024, p. 44）这种隐秘的布防构成了对隔离区的无声威慑，即便黑人少年约翰与贝奇设法逃离，仍无法摆脱权力视线的追踪。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监控并非黑人所独有，白人中产阶级卡伦太太在被怀疑与黑人革命者有联系时，同样遭遇警方粗暴搜查，住所被翻查，并被告知“现在没什么东西是私人物品了，”（库切，2024, p. 76）凸显了例外状态下主权对任何个体的彻底剥夺。更深层的规训体现在全景监控的内化机制中。Geoff Danaher 等人（2000, p. 50）指出，“最有效的监视形式是自我监视。人一旦被驯化，就会持续自我检验以确保未做非法之事”。小说中，邻居“打电话提醒”卡伦太太庭院里有个流浪汉的情节，正是这种横向监控与权力内化的体现。最终，持续监视导致精神压迫与主体性瓦解，卡伦太太对“来世”的绝望想象——“永远处在他人凝视之下，私人生活终结，”（库切，2024, p. 12）象征了全景监控下个体精神世界的崩塌。

更为隐蔽的规训来自精神领域。主权借助大众传媒与审查制度对个体意识施加控制，使规训延伸至思想与认知层面。福柯所论述的规训权力在信息时代被进一步扩展，大众媒体在技术重塑后成为跨越时空的巨大话语装置，以表面的“信息自由”掩盖深层的意识形态操控。在南非隔离制度下，《出版控制条例》等法律建立了严格的新闻与出版审查制度，批评政权的内容被系统性封禁，公共舆论空间陷入沉默与自我审查。小说中，学校骚乱、黑人社区枪击等事件被集体噤声，而媒体却不遗余力地塑造“种族和谐”“社会稳定”的虚构景象。卡伦太太对这种传媒景观的控诉极为尖锐：“在他们身下生活的耻辱：摊开报纸，打开电视，就像是跪着被人尿在头上。”（库切，2024, p. 3）库切（1992, p. 361）指出，主权通过制造“不被看见”的现实，让不符合其话语的生存境况彻底从公共视野中消失。因此，赤裸生命的生成不仅源于法律的悬置，也源于公共可见性的剥夺。当某些生命状态被系统性地从公众视野中抹除时，它们在社会意识中便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最终被合法化地忽视与弃置。这种精神规训的最终效果，是个体政治能动性的全面瓦解，他们不仅失去了发声的权利，更失去了感知与理解苦难的能力，彻底沦为可被任意处置的生物性存在。

三、赤裸生命的生存危机

《铁器时代》以个体叙事的方式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潜藏的生存危机：在例外状态的制度逻辑中，任何人都可能在某一瞬间沦为“赤裸生命”——被剥夺法律庇护、直接暴露于主权权力支配之下的生命存在。小说中，遭受警察暴力撞击的黑人男孩、生活在持续镇压与恐惧之中的黑人群体，以及表面享有特权、实则同样陷入权力结构困境的白人中产阶级卡伦太太，均无法置身事外。无论种族、阶层或性别，他们都在不同层面上面临生存威胁。库切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轨迹，具象化地呈现了主权权力对生命的多重戕害，并在苦难书写中凸显出自身的道德立场与文学担当。他不仅以叙事批判政治暴力，更借助小说形式实践作家的伦理责任与社会使命，使文学成为反思与抵抗的重要场域。

库切一贯强调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小说不应仅仅是故事的承载工具，而应成为承载伦理探问与批判意识的空间。他将作家的责任分为由社会赋予的公共义务与源自自身良知的内在使命两类。（Coetzee, 1992, p. 340）学者 David Attwell（1993, p. 91）亦指出，应该将库切的小说放置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南非历史语境之下，思考其政治与伦理意义。《铁器时代》正是这种文学责任观的集中体现，文本从个体、家庭和社会三个维度深入揭示赤裸生命的危机形态，并以批判与反思的姿态，揭开主权权力摧残生命的机制。

在个体层面，主权权力的暴力统治对人的身体与精神造成了双重创伤。卡伦太太虽为白人中产阶级，外表似乎处在制度的庇护之下，但她既无法逃避现实中不断扩散的政治暴力，也无法回避作为特权阶层成员而在制度运作中被动共谋的羞耻感与内疚感。尤其在目睹“自行车事件”——两名警察公然暴力袭击黑人少年的全过程后，她毅然前往警察局指控涉事者。然而，面对执法者的冷漠、推诿与不作为，她陷入了深刻的道德痛苦，并将这种痛苦与个人身份直接联系起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为这身制服感到骄傲，但你街上的同事辱没了它。他们也羞辱了我。我感到羞耻。”（库切，2024, p. 36）这里的“羞耻”并非一时的情绪反应，而是一种深植于身体、持续积累的存在状态，并最终与癌症的形式显现。她坦言：“我得癌症是因为我这一辈子忍受和积累了太多的羞耻。”（库切，2024, p. 63）这种叙述方式将身体疾病与精神创伤之间建立起象征性关联，使疾病不仅是生理事件，更成为长期压抑、伦理冲突与制度性暴力相互作用的政治隐喻。正如 Susan Sontag（1991）在《疾病的隐喻》中所指出，癌症在公共话语中往往承载着“外来”“扩散”“不可控”的象征意义，这恰好映射了主权政治对社会机体与个体生命的侵蚀性本质。在卡伦太太的自我认知中，权力如同癌细胞一般，无孔不入地渗透生活，并持续破坏精神与身体的完整性：“但我为什么就得承认，即使换一批人在这片土地上掌权，我的生命也一样没有价值？毕竟，权力就是权力。权力侵犯人，这是它的本性。权力就是会侵犯人的生命。”（库切，2024, p. 50）这一自觉使她的抗争不仅是道德上的拒斥，也是一种在身体—政治层面上的觉悟。

在家庭层面，赤裸生命的危机直接影响了亲密关系的稳定与延续。残酷的政治现实不仅摧毁了个体的精神世界，也迫使家庭成员在安全与道义之间做出痛苦抉择。卡伦太太的女儿因无法忍受南非的政治黑暗与社会暴政，毅然选择远赴美国，并发誓“走了就不回来了。”（库切，2024, p. 31）离别前，她紧紧拥抱母亲，神情坚定地恳请对方不要再召唤她回国，并以象征性的动作“踩掉了这个国家留在脚上的尘土，”（库切，2024, p. 60）完成对家国的切割。这不仅是个人的政治选择的体现，更是对制度性暴力的绝对拒绝。对于母亲而言，这一离去既是理智上能够理解的现实，也是一种情感上的持续撕裂。她渴望女儿能回到身边陪伴自己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却又清楚女儿立场的坚定与决绝。在疾病日益恶化之际，她通过写信向远方的女儿倾诉思念与孤独：“我是多么地想念你！我多想能上楼走到你身边，坐在你的床上，指尖抚着你的头发，像你上学时的那些早晨一样在你耳边轻唤……你就是我的生命；我爱你，就像爱生命本……”（库切，2024, p. 2）然而，忆起女儿曾发誓不再回到南非，她只能将渴望压抑于心：“我心里有一盏灯始终亮着，始终朝着西北方向……万一你哪天心一软，不顾一切地要回来看我。”（库切，2024, p. 60）她选择隐瞒病情，用沉默与克制守护母爱的尊严。家庭亲情在政治暴力的阴影下被迫转化为远距离、间接的情感传递，这种隔绝本身便是权力对生命关系的另一种掠夺。

在社会层面，国家主权暴力的戕害体现为对整个民众群体的系统性压迫与结构性剥夺。小说描

绘了一个监控与镇压无处不在的社会景观：法律被悬置，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剥夺，生命价值被降格为可牺牲的工具性存在。在这种环境下，社会群体间的裂痕不断加深，敌意与仇恨成为政治秩序得以维系的潜在逻辑。隔离区的青年人因长期遭受不公待遇，纷纷投身反抗暴政的斗争，种族冲突愈演愈烈。当卡伦太太走出停放黑人儿童尸体的大厅时，她敏锐地感知到黑人人群中弥漫着的情绪：“怨恨，憎恶。说得更重一点：仇恨。”（库切，2024，p. 47）她清楚地意识到，即便自己并未与镇压者同流合污，黑人群众也不会因此原谅她，因为她的白人身份在象征意义上与压迫机制紧密相连。此刻，她不仅是个人意义上的“赤裸生命”，更是被整体性敌意锁定的符号性存在。

这一场景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国家暴力如何通过制造恐惧与不信任，将社会撕裂为彼此敌对的群体，令公共生活陷入持久的冲突循环。在这种结构中，仇恨不仅是反抗压迫的情绪反应，更被制度性地吸纳和利用，成为维持统治的隐秘工具。最终，在主权权力的全面渗透与侵蚀下，人性与尊严被剥夺殆尽，整个国家被塑造成一个象征性的“铁器时代”——冷酷、坚硬、充满死亡的气息。正如卡伦太太在信中所写：“老实说，当我走在这片土地上，南非的这片国土上，我越来越觉得，我是走在无数黑人的脸上。他们死了，但他们的灵魂没有离开他们……数以百万计的铸铁猪俑漂浮在大地的表层之下。铁器时代在等待着重新回归。”（库切，2024，p. 54）这里，“黑色面孔”象征着被牺牲者不肯离去的冤魂，他们在道义层面持续对生者发问；而“铸铁猪俑”则暗喻冷血的主权机制，像金属一般坚硬、冰冷且充满敌意，不断制造新的牺牲与死亡。

四、赤裸生命的抵抗策略

《铁器时代》描绘了个体在主权权力暴力压迫下赤裸、无庇护的生存状态。然而，库切并未让叙事完全陷入绝望，相反，他在死亡与失序的阴影中揭示出生命的微弱抵抗与伦理可能。在访谈与随笔集中，他曾明确表述自己的创作立场：“我并不为特定的群体发声。我对自由有一种亲近感（正如任何受到枷锁束缚的囚徒一样），我再现人们的身影——挣脱锁链，面朝光明”。（Coetzee, 1992, p. 341）这一主张在《铁器时代》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小说中的白人与黑人个体，分别通过关怀自我与关怀他者，在主权规训之外挣扎重建主体性，试图在暴力与剥夺的夹缝中“挣脱锁链，面朝光明”。

首先，赤裸生命通过“关怀自我”（Care of the Self）在精神层面寻求自由与尊严的恢复。作为一位身患癌症、行将就木的白人女性，卡伦太太面对种族暴政与社会失序，并未被彻底吞没于绝望之中，而是在濒死的过程中坚持维护属于自己的精神秩序。她反复聆听巴赫与肖邦，用音乐构筑一个远离国家机器控制的审美空间：“在一遍遍的重复中，有些真正的东西还是能浮现出来，那是真正的音乐，永生的、自信的、安详的音乐。”（库切，2024，p. 9）这一看似消极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柔性的抵抗。音乐的非语言性使她暂时脱离政治话语的规训，逃避了被意识形态塑形的危险，保留了不被同化的内在领域。正如福柯（1995）所论，现代权力不仅通过法律与制度约束身体，还通过话语与知识塑造主体性，使之成为可管理的身体与主体。卡伦太太拒绝成为纯粹服从的被规训者，她在死亡逼近的时刻依然坚守审美与精神的自主性，从而完成对主权逻辑的个人拒斥与主体确认。这种“关怀自我”并非逃避社会责任，而是通过精神领域的自我保存，为反抗权力暴力保留一个无法被占领的内部空间。

与此相对，黑人角色更多通过“沉默”回应主权权力的统治。小说中，沉默作为场景与情绪反复出现：在卡伦与弗洛伦斯一家或流浪汉范库尔的交流中，“一阵沉默”总是突然而至。他们刻意保持情感克制与语言距离，不辩解、不诉说、不请求理解。这种沉默并非出于无力，而是一种有意的“非合作”。他们拒绝进入主权的话语系统，否认权力赋予他们的“可说的身份”，从而悄然守护自己的生存边界。福柯（1990，p. 27）在《性史》中指出：“在话语中，权力与知识结合在一起”。当国家通过语言建构历史与主流叙述时，沉默本身便成为一种断裂机制，是对话语霸权的消极否定与去势化行为。弗洛伦斯一家与范库尔拒绝被书写、被解读、被施舍，他们用沉默抹平了权力企图建立的解释框架，使主体性与尊严在拒绝发声的静默中得以保存。这种策略与其说是屈服，不如说是在缺乏安全公共空间时，保存自我、延缓被彻底消解的重要方式。

其次，小说展示了赤裸生命之间的相互关怀如何打破主权制造的种族隔阂，成为更深层次的伦

理抗争。卡伦太太不仅为黑人流浪汉范库尔提供栖身之所，还在自身病情严重恶化之际，冒险前往黑人聚居区寻找弗洛伦斯的儿子贝奇，并在警察追捕中竭力保护黑人少年约翰。这些行为并非出于慈善或优越感，而是基于对他者处境的真切同情。法国哲学家 Emmanuel Levinas (1969) 曾强调，主体性并非在封闭的自我中心中生成，而是在回应“他者的呼唤”中获得确立。卡伦太太正是在与黑人他者的接触与交流中，完成了从自我封闭向伦理开放的转变——她不再仅仅是一个见证苦难的旁观者，而是愿意为他者的安危与尊严承担风险的行动者。

这种相互关怀的伦理维度，在卡伦太太与范库尔的关系中达到高潮。范库尔作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几乎被剥夺了一切社会身份与保障，但他在卡伦生命的最后阶段给予了持续陪伴与实际帮助。他不仅在她最虚弱时照料日常，还答应在她去世后将信寄出，以完成她与女儿之间的情感传递。这一回应象征着一种超越制度逻辑的信任关系：双方既无权力，也无庇护，却在共同的生存困境中建立起基于责任与互助的伦理纽带。正如阿甘本 (1998) 所言，赤裸生命虽然是主权宰制的对象，但在共同的脆弱处境中，它们也可能成为重建共同体的基础。当所有人都被降格为可弃、可杀的“裸命”时，正是在对这一共同命运的认知与关切中，新的主体关系才有可能萌发。

在这一意义上，《铁器时代》的抵抗叙事不仅是个人精神层面的抗争，也是一种去主权化的社会实践。关怀自我让个体在精神上保持不被占领的领域，沉默使被压迫者拒绝进入权力设定的叙述框架，而跨种族的关怀与互助，则在现实的裂隙中重建了伦理共同体。这些策略都不是对抗暴力的对称反击，而是以微弱却持久的方式削弱权力的渗透，使主体性在极端条件下得以延续。库切在小说中传达的正是这种信念：即便在主权权力全面压制的“铁器时代”，人类依然能够在音乐、沉默与相互关怀中保有向光而行的姿态。

五、结语

《铁器时代》以冷峻的笔触揭示了南非主权利在例外状态中通过悬法，将公民从受法律保护的政治主体降格为任权力宰制的“赤裸生命”。小说细致呈现了这一机制在空间重构、身体规训、精神渗透等多重维度的运作方式，并通过个体、家庭与社会三个层面的叙事，描绘了赤裸生命在生理痛感、情感裂解与社会敌意中的生存困境。疾病、羞耻、离散与仇恨交织成沉重的现实景观，使生命在主权利力的阴影下持续被削弱与贬损。

然而，库切并未将叙事封闭于绝望之中。他通过关怀自我与关怀他者的抵抗策略，为赤裸生命的处境开辟出微弱但真实的伦理可能。卡伦太太在精神上守护音乐与审美的自由，以非语言性的体验逃离意识形态的规训；黑人角色通过沉默拒绝进入权力设定的话语体系，在静默中保存尊严与主体性；跨种族的相互关怀打破隔阂，在共同的脆弱处境中重建去主权化的伦理共同体。这些细微而持续的行动，虽不足以改变结构性压迫，却在极端环境中为主体性延续提供了条件。

由此，《铁器时代》不仅是对南非特定历史现实的文学见证，更是对现代政治哲学中生命政治、例外状态与赤裸生命等核心议题的艺术性回应。作品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感的叙事经验，超越了地方性议题，触及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

自 1990 年问世至今，国际政治格局多次变动，但作品的政治意蕴与伦理内涵依然鲜明。在恐怖主义全球蔓延、欧美右倾民粹抬头、“历史终结论”破产的当下，例外状态与生命政治已不再是南非的特殊现象，而是全球政治生活的普遍隐忧。《铁器时代》犹如一记持久的警钟，提醒人们警惕权力在危机名义下对生命的无限制介入，并在压迫与分裂中寻找维系伦理与尊严的可能之道。

正如卡伦太太在信中传递的微弱希望，库切的文学并未提供宏大的救赎方案，而是指向一种姿态——在权力阴影下，仍保持对自由的亲近感、对他者的回应意愿，并在任何可能的缝隙中，挣脱锁链，面朝光明。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南非英语小说空间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0BWW06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Luo Wenjie ^{ID} <https://orcid.org/0009-0004-0335-1268>

Shi Juhong ^{ID} <https://orcid.org/0000-0003-1000-2416>

References

- Carl, Schmitt (2005). *Political Theology: 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trans. George Schwab.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avid, Attwell (1993). *J. M. Coetzee: South Af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mmanuel, Levinas (1969).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trans. A. Lingis.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 Geoff, Danaher, Tony, Schirato & Jen Webb (2000). *Understanding Foucault*. Allen & Unwin.
- Giorgio, Agamben (1998).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orgio, Agamben (2000). *Means without End*, trans. V. Binetti & C. Casarino.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J.M. Coetzee (1992). *Doubling the Point: Essays and Interviews*. Harvard UP.
- 库切 (Coetzee, J. M.) (2024): 《黑铁时代》，李青长译。四川文艺出版社。
- [J.M. Coetzee (2024). *Age of Iron*, trans. Li Qingchang. Sichu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Laura, Wright (2008). “Displacing the Voice: South African Feminism and J.M. Coetzee’s Female Narrators.” *African Studies* (01): 11-32.
- 李琛 (2010): “库切小说《铁器时代》中文化混杂性解析”，《库切研究与后殖民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01): 410-418。
- [Li, Chen (2010). “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Hybridity in Coetzee’s Novel Age of Iro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etzee Studies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01): 410-418.]
- Michel, Foucault (1986). “Of other spaces.” trans. J. Miskowiec. *Diacritics* (01): 22–27.
- Michel, Foucault (1990).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trans. R. Hurley. Vintage Books.
- Michel, Foucault (1995).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 Sheridan. Vintage Books.
- 邵凌 (2010): “库切的政治观与文学创作”，《外国文学》(06): 78-84, 159。
- [Shao, Ling (2010). “Coetzee’s Political Views and Literary Creation.” *Foreign Literature* (06): 78-84, 159.]
- Suadah, Salih & Lajiman, Janoory (2020). “The Voice of the Black Female Other: A Post-Colonial Feminist Perspective in J. M. Coetzee’s *Age of Iron*.” *Malay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10): 267-276.
- Susan, Sontag (1991).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 Penguin Books.